

土族社会发展现状 调查研究

胡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土族社会发展现状 调查研究

胡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土族社会发展现状调查研究 / 胡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9

ISBN 978 - 7 - 5203 - 0664 - 5

I. ①土… II. ①胡… III. ①土族—社会发展—
调查研究—中国 IV. ①K283.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5660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刘 艳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陈 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75
插 页 2
字 数 308 千字
定 价 8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在河湟流域繁衍生息着一个历史悠久却又人口较少的民族，这就是勤劳聪慧的土族。学界对土族的族源有不同的观点，但大多认为其主要的源头之一就是鲜卑吐谷浑。唐高宗龙朔年间，在吐蕃强大的军事攻击下，吐谷浑国除了部分贵族率部数千帐内附唐王朝外，辽阔的疆域被吐蕃彻底兼并，许多吐谷浑人成了吐蕃政权的新居民，其中一部分则牧耕在于河湟流域的山谷之中，这些人后来逐渐形成一个族群，被史书称为“西宁土人”。从唐宋元明清的历史看，这些“土民”是该流域繁衍传承从未中断过的主体民族之一。正因为如此，他们拥有连续传承千年以上的丰富多彩的民族历史文化，具有包容多元却又独具特色的社会组织和运行机制。新中国成立后，被正式认定为“土族”，并迅速融入到了共和国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管理体制之中，成为河湟地区不可或缺的世居民族，并以其鲜明的民族社会文化而彰显于中华民族之林。

关于土族的社会文化，早在 19 世纪末就引起了外界的关注，直到 20 世纪中叶的 50 年间，中外旅行家、传教士、记者、学者等对土民的语言、习俗、宗教、人口分布、土司制度等进行了不同侧面和深浅不一的描述记录，为我们了解旧中国时期的土族社会文化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但这些除了对土语和土司的系统记录和深度梳理外，大多是走马观花式的印象和粗略的评介，还谈不上真正意义的系统研究。20 世纪 50 年代后，国家重视民族社会文化调查的大背景下，相关政府机构和研究机构对土族社会历史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调查，出现了《青海土族社会历史调查》等书籍，较为全面地勾勒和展示出了土族的社会文化，同时也出版发表了一批相关的著作和论文。但总体来看，由于早期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的学术境遇，使得调查研究的理论方法在

科学性系统性上有较多欠缺，加之群众式调研的局限性，这些成果或重于方方面面的介绍，或重于某一方面的个人见解，或重于散文式的采风想象，普遍缺少整体性的科学调查研究，无法全面系统而科学中观地进行内涵深描和文化诠释。同时，社会在近数十年的社会巨变中发展前进，60年岁月沧桑，主流文化和现代文化不断地冲击着土族的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变化实所难免。另外学术研究也在不断创新发展中，从理论方法到资料都有着前所未有的提升和积累。真所谓今非昔比，不可以秦汉来论魏晋。这就需要有一部以现代理论方法科学调研后撰写的土族社会文化发展现状的厚重之作，这是学术的时代需求，也是民族的深情呼唤。适逢此时，我读到了胡芳研究员的这部书稿《土族社会发展现状调查研究》，其科学的表达和厚重的分量，令人欣赏，并使我想起了“春江水暖鸭先知”，“早有蜻蜓立上头”的诗句。

我对这部著作之能够先睹为快，是因为作者和我有师生之谊而索序。知人论事，理之使然。胡芳研究员是土生土长的土族学者，自从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一直从事青海民族文化和土族历史文化的研究，论著颇丰，记得晋升研究员时，仅副高期间的成果量就多达80万字左右，其中专著多部，省部级奖项也不少。其间她曾考到青海师范大学跟我攻读民俗学硕士学位，后来又一起在同一单位共事数年，因而学业上接触较多。她的做人做事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不仅勤勉执着，而且恪守伦理。特别是接受专业规范训练之后，在一向勤奋科研的基础上，刻意学术品质，自觉遵循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加上扎实科学的理论运用和资料使用，学术上真正实现了品质升华。二是坚守公德原则，绝不趋势投机。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以一个良好的公民标准作为言行准则，不畏恶强，坦诚直言，把自觉维护学术环境和社会良俗看作是她应有的责任。即使在多次国际学术交往中，面对各类大咖，也总能挺身而出，力言学术应有的责任和边疆稳定的必要。而在地方上这样做，难免无意间会冒犯一些权势，个人利益当然会受到损伤，但她说只有这样才问心无愧，活着坦然。三是始终谦卑律己，不计个人得失。她既力求学术品质，又坚持伦理原则，但又虚怀若谷，且淡泊名利，不偏执，不计较，斤斤计较更是和她丝毫不沾边。她总是说自己研究能力有限，和有水平有贡献的人相比还很差，没有资格去争名夺利，因此一贯

拙于言而勤于行。有此三点，我觉得一个优秀学者应该具有的品质在她身上已经满满地表现了出来。

我一直认为做人做学问是相辅相成的，而且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一个具有优秀品质的专业学者，做出像样的研究项目自然在情理之中。加之我还有幸从一开始就不时参与这个选题的策划研究经过，比较了解作者的研究思路和成书过程，所以初步判断此著质量不差。通览书稿，验证了我的预测不假。综观整个著作，至少有以下几方面是值得肯定的。

一、从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整体观照，点面结合，探究规律，志在超越研究。作者首次把土族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进行调查研究，从而对整体性认识土族社会文化发展现状不失为是一个不但新颖而且准确的视角，特别是把调查和研究视角瞄准在现代化转型时期的发展现状这一具有很强的现实性视域中，就更具有了不同以往学界的创新意义。但是，青海土族分布在互助、民和、大通、同仁等县，形成“大杂居、小聚居”态势，分布地广，形态多样，就作者一人的调查是无法采取普查方式的。好在著作的立意并不在于普查资料或材料汇编，而是揭示其在现代化转型期间的发展现状特点和规律，是学理性社会学调查研究，所以作者选择各地具有代表性的土族乡镇和村落为田野调查点，深入调查和分析归纳，采取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方式，对土族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进行了翔实而又细致的调研，并适当兼顾了民国时期、20世纪50年代、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及21世纪以来土族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的历史。同时对互助、民和与同仁3个土族传统聚居区在现阶段的分布、人口结构、社会政治、经济生产结构、婚姻家庭结构、民族教育发展、语言文字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宗教信仰结构、民俗文化遗产等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进而客观真实地展示和揭示了土族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的现状和内在机制。所以这是一次对分布多地、形态各异的少小民族社会发展现状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综合实证研究，尤其是对土族社会现状来讲，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方面，都是一次具有创新意义的探索。

二、根据研究对象灵活运用具有针对性的理论方法，纵横捭阖，科学规范。从书稿可以感知，作者在理论层面上运用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人口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对互助、民和三川、同仁“五屯”

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土族聚居区进行了整体研究，全面反映了在现代文明的碰撞下，土族民族文化的自我调适与重构；而在研究方法上运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在对互助、民和、同仁等地土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现状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系统整理、纵横比较，主题归纳，进行了定性分析；而就土族的婚姻家庭、经济生产、语言文字、家庭生活和消费、社会保障等现状的引证资料，是作者运用社会学的问卷调查与经典统计学 SPSS 17 统计方法进行问卷调查和户访、座谈得来的，并利用图表、数据等方式进行定量分析；对土族人口的数量变动、性别与年龄结构、生育水平与年龄别生育率、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等状况，则运用人口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与分析；同时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不仅对民国时期、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以及 21 世纪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土族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也对互助、民和与同仁三个不同地区的土族社区的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进行了比较研究。需要肯定的是，作者在使用多种方法时，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根据实际综合考虑，不仅相互衔接，而且相得益彰，相互照应。这在方法论上富有内化多元、融为一体的特色。

三、扎实田野，系统梳理，丰富坚实的材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对于研究者来说，丰富而准确的新资料是最坚实的基础，也是做学问的根本。为此作者首先在田野调查方面坚持亲历实录、客观公正的原则，遵循学术伦理和规范，长时间、多次赴田野调查点进行实地调查，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了使调查报告更加客观和翔实，作者还多次补充调查，对个别村落的调查次数多达十几次。作者还设计使用了“土族社会发展现状学校调查问卷”“土族社会发展现状家庭调查问卷”“土族社会发展现状村落调查问卷”三种调查问卷，亲自发放、指导填写或咨询、回收整理。获取了可感且可靠的具体数据。其中经历的种种酸甜苦辣，只有作者自己才能体会到吧。这些历尽艰辛得来的调查资料在著作中当然很自然灵活并且规范有序地得到了呈现，从而为书稿质量奠定了厚实可靠的基础。不仅如此，作者不唯田野调查，还下功夫全面细腻地梳理了有关土族社会文化的文献资料，如各时期的地方志、人口普查数据、民族民俗志和文人散记，并把这些文献资料与调查材料相互对比印证，发微其社会文化的发展规律。因此，这在书稿中有着非常丰富

的呈现。可以说，本书在资料的调查、发掘和整理、应用上富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大量可信的资料。

四、论证体系完整，观点新颖，结论可信。作者通过方方面面的层层论述，对当下的土族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提出了许多个人的观点，得出了真实可信的结论。比如通过对土族人口负担系数的分析得出了“当前土族的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例高，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且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处于财富积累和社会经济较快发展的黄金时期”的结论；通过对问卷调查中得到的数据分析，概括出了“当前，土族的生产方式仍以农业生产为主，工商业所占比重仍比较低，但其劳务经济发展迅速，已成为增加土族农民收入的一项特色产业，其养殖业、手工业等也有了较快发展，土族的产业结构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的观点；通过对大量访谈资料的归纳总结，认为“传统靠天吃饭，家庭经营单一，或缺乏劳动力，依赖性强、自主创业性不够的家庭，收入普遍低；家庭经营多元化，从传统农业向特色农业、规模化农业和养殖业转型，特色经营或劳务经济开展较好的家庭，收入普遍较高”；而通过对家庭结构的分析，认为“土族家庭正在逐渐从居住于同一区域的直系扩大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人数逐渐减少，家庭结构趋于简单，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全书中诸如此类来自田野调查研究观点表达，可谓不胜枚举。正是这些源自扎实田野和科学研究的个性论述与鲜明观点，使得著作具有了不同于普泛之作的学术创新内涵。

我个人觉得，有以上四点，就可以称之为是一部真正的富有含金量的学术著作了。而能有此四点，除了作者的学术质量追求、学科规范伦理、扎实田野和科学研究之外，还不能不强调的是，作者作为土族学者，本身就是土族社会文化中生长起来的，还是土族社会文化的研究者和守望者，对自己民族的社会文化十分熟悉，尤其是作为民族文化表征的土语，是作者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交流工具，对其音律、词义、语法的细微之处也完全了熟于心。这就使得她在田野研究中能把母语和汉语、学术语言，口头语与书面语、学科表述准确而轻松地对接转译，成为了她调查研究的利器，从而保证了学术质量。当然，如果仅仅是熟悉一种民族语言，而对汉语不能熟练使用，就很难用汉语说清楚其民族社会文化，尤其是没有学科训练，就更不可能进行学术研究和学理表述。反

之，也就不可能真正全面系统地了解和理解其民族社会文化，至多是从别人的汉语文章中揣测转抄而已，这种“二手货”在当下学界却较为泛滥。我曾经遇到一位教授，自称是研究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且自视甚高，对他人总是嗤之以鼻。可是他既没去过德国，也没有经过科班训练，更要命的是别说德语，连英语的26个字母都背不出来，无非是买了一摞汉译本的海氏翻了翻，又读了几篇别人评介海氏的文章，于是乎就趾高气扬起来了。我实在不明白这位教授的底气是从哪里生成并膨胀起来的！两相比较，胡芳研究员的土族社会发展现状调查研究的确可能没有海德格尔研究高大上，但我更欣赏，因为她是精通土语及其民族历史文化、学科专业和学术表述、汉语写作的基础上，通过扎扎实实的田野调查和规规矩矩的学理分析而归纳、锤炼出来的。我们的社会和学术需要这种来自田野实践的得力之作！

赵宗福

2017年3月22日于湟滨

目 录

绪 论	(1)
一 选题的缘由与研究状况	(1)
二 调查点的选择与基本情况	(7)
三 调查工作的过程与取得的成果	(10)
四 研究方法、重点与难点	(11)
第一章 土族的概况与历史	(14)
第一节 自然概况	(14)
一 自然环境	(14)
二 气候	(16)
三 资源	(17)
第二节 历史沿革	(19)
一 民族源流及形成	(19)
二 土司制度及其衰落	(21)
第三节 地域分布	(23)
一 分布状况	(23)
二 行政区划沿革	(25)
第二章 土族的人口	(28)
第一节 人口的数量变动	(28)
一 人口演变及增长情况	(28)
二 人口发展变化的主要特点	(31)
第二节 人口分布状况	(34)
一 全国及城乡分布状况	(34)
二 青海、甘肃两省土族人口分布状况	(36)

第三节 性别与年龄结构	(38)
一 性别结构及其变动	(38)
二 年龄结构及其变动	(39)
三 社会负担系数及其变动	(41)
第三章 土族的社会政治	(45)
第一节 基层管理体制	(45)
一 民族区域自治政权的成立	(45)
二 自治县、乡管理组织	(48)
三 村级管理组织	(50)
第二节 民主政治与村落管理	(52)
一 公正公开的民主选举	(52)
二 贯彻村务公开制度	(53)
三 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开展	(56)
四 基础设施建设	(63)
第三节 土族的社会保障	(66)
一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67)
二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69)
三 农村低保制度及民政救济项目	(71)
第四章 土族的经济生活	(75)
第一节 在业人口的职业分布状况	(75)
一 在业人口的产业结构及其变动	(75)
二 在业人口的职业结构及其变动	(77)
第二节 经济发展现状	(81)
一 农业发展现状	(81)
二 畜牧业与养殖业发展现状	(85)
三 经济作物种植与劳务经济	(88)
第三节 收入与生活消费	(92)
一 家庭经营与收入	(92)
二 生活状况与消费	(98)
三 劳动方式与生产安排	(109)

第五章 土族的婚姻家庭	(114)
第一节 婚姻状况	(114)
一 婚姻形态	(114)
二 婚姻构成现状及其变动	(118)
三 婚姻形态的变迁	(122)
第二节 家庭状况	(125)
一 家庭结构与类型的变化	(125)
二 家庭观念与家庭关系的变化	(128)
第三节 生育状况	(132)
一 生育水平	(132)
二 年龄别生育率与生育模式	(136)
三 计划生育	(139)
第六章 土族的教育	(142)
第一节 土族人口的受教育状况	(142)
一 土族人口的文盲率	(142)
二 土族人口的受教育水平	(145)
三 土族分性别和年龄受教育状况	(147)
第二节 土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历史发展	(150)
一 历史上土族地区的教育状况	(150)
二 土族地区现代教育的蓬勃发展	(153)
第三节 土族民族教育的发展现状	(156)
一 学前教育现状	(156)
二 小学教育现状	(158)
三 中等教育现状	(162)
第七章 土族的文化	(167)
第一节 语言文字的使用	(168)
一 语言的使用情况	(168)
二 新创文字的使用	(173)
第二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	(175)
一 土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现状	(175)
二 土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现状	(182)

第三节 文学艺术的发展	(189)
一 土族作家文学的发展	(189)
二 民族艺术的创新与发展	(193)
第八章 土族的宗教生活	(196)
第一节 多元的宗教信仰体系	(196)
一 藏传佛教信仰及其现状	(196)
二 萨满教与道教信仰及其现状	(198)
三 民间信仰的发展现状	(201)
第二节 宗教设施与人员	(207)
一 土族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	(207)
二 土族村落的主要宗教设施	(210)
三 土族地区与信仰有关的各种人员	(213)
第三节 主要宗教活动	(217)
一 以个人或家庭为中心的主要宗教活动	(217)
二 以村落为单位举行的主要宗教活动	(220)
第九章 土族的民俗生活	(228)
第一节 日常生活习俗	(228)
一 居住与生产习俗	(229)
二 饮食民俗	(236)
三 服饰民俗	(239)
第二节 人生仪礼	(243)
一 诞生礼	(243)
二 婚礼	(246)
三 葬礼	(252)
第三节 岁时节日习俗	(255)
一 春节节日习俗	(255)
二 青苗会与“梆梆”会	(259)
三 土族纳顿节与热贡六月会	(264)
余 论	(270)
参考文献	(281)
后 记	(285)

绪 论

一 选题的缘由与研究状况

土族是我国西北人口较少的一个少数民族。土族主要聚居在青海省,少数聚居在甘肃省,为青海省五个世居少数民族之一。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土族人口为28.96万人。其中青海省土族人口为20.44万人,占总人口的70.58%;甘肃省土族人口为30781人,占总人口的10.63%。土族主要分布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等地,其分布格局呈现出了“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

土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从历史的纵向时空考察土族的形成、发展与变迁,我们发现土族所生活的河湟地区一直是中原文化、吐蕃文化与西域文化碰撞最为激烈的地区。作为中原与西北各民族及西域政治、经济、文化势力的中间地带,河湟地区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域内文化与域外文化双向交流与扩散、传播的桥梁。而世代繁衍生息在河湟地区的土族,自古以来是一个广容博纳的民族,其文化具有强烈的“多重文化时空层叠整合”的特征,始终是在不断整合其他民族文化特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①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个典型例证。

早在清末民初,土族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群体,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土族研究日趋兴盛,其范围与主题不断拓展,研究方法和理论也日益多元化,成果不

^① 李志农、丁柏峰:《土族——青海互助县大庄村调查》,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断增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土族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从总体上说,学界对土族的关注与研究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

近代对土族的研究,始于 19 世纪末外国学者对土族语的记录与关注。1885 年,俄国伊尔库茨克博物院副院长坡塔宁(G. N. Potanin)在青海省民和县官亭地区收集土语三川方言,后在其 1892 年所著的《中国之唐古特吐伯特边地及蒙古中部》第二册中录有三川土语。1891—1892 年,美国驻华公使秘书柔克义(W. W. Rockhise)在土族地区旅行时,也收集了一些土语方言材料,收录在其撰写的《蒙藏旅行家》卷末。1911—1922 年,比利时神父许让(Lep. L. Schram,中文名康国泰)在西宁地区传教,对土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传教之余对互助县土族的婚姻制度、民族历史、社会组织、宗教生活进行了系统的调查与研究。1932 年由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出版《甘肃土人的婚姻》,后来在美国费城出版《甘肃边境的土族》三大册,包括《甘青边界蒙古尔人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1954)、《土族的宗教生活》(1957)、《土族族谱》(1961)。1993 年,费孝通先生和王同惠女士翻译的《甘肃土人的婚姻》中文版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2007 年,李美玲教授翻译的《甘青边界蒙古尔人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 世纪 30 年代,比利时天主教普爱堂神父德斯迈和孟塔尔,依据互助县沙塘川那林沟语言材料撰写了以《甘肃西部蒙古语蒙古尔方言》为题的三部著作:《音韵》[载《Anthropos(人类)》杂志 1929 年第 24 期、1930 年第 25 期、1931 年第 26 期]、《文法》(1945 年北平单行本)、《土语字典》(1933 年北平辅仁大学单行本)。这三部著作从语音、词汇、语法方面初步确认土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1946—1949 年,瑞典人 Dominik Schroder 传教士居住在土族地区,对土族宗教与历史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20 世纪 40 年代,德国学者施劳德在互助县威远镇向当地老艺人搜集了用土语讲唱的《土族格赛尔》史诗,首先用德文出版,1994 年由李克郁教授翻译为中文,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一时期,国内对土族的调查与研究也开始起步。如成书于 1926—1932 年的《互助县风土调查记》《民和县风土调查记》《大通县风土调查记》《乐都县风土概况调查录大纲》和《同仁县风土概况调查

大纲》等政府档案与系列调查资料中保存有大量有关土族社会历史、宗教与文化等史料。当时，国内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记者、学者还从人口分布、民俗风尚、土司制度、民族族源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对土族进行了调查，并撰写了大量的游记、报道文章。如马鹤天《西北考察记·青海》（1932年铅印本）、乐天《青海之土人》（1933）、丘向鲁《青海各民族移入的溯源》（1933）、黎小苏《青海民族状况》（1934）、孟希元《互助县土人调查记》（1934）、张德善《青海种族分布概况》（1935）、庄学本《互助县塘巴堡土人》（1936）、祁世绩《西祁土司的今昔观》（1937）、陈万言《西北种族史》（1938）、卫聚贤《李克用后裔族谱》（1941）、陈秉渊《青海李土司世系考》（1942）、杨堃《甘肃土人的婚俗》（1943）、韩儒林《青海佑宁寺及其名僧》（1944）、陈寄生《青海土人为吐谷浑后裔考》（1945）、卫惠林《青海土人的婚姻与亲族制度》（1947）、童秀清《青海土司史略》（1948）等。上述论著虽然由于受社会历史背景等条件制约，尚停留在介绍叙述或研究的初期阶段，但为我们研究当时土族的分布、族源与社会发展现状提供了许多重要情况与线索，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

（二）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国家有关部门在全国举行了大规模的社会历史调查。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陈永龄、汪公量、宋蜀华等组成的甘青地区民族调查组分别于1953年和1958—1959年赴互助县、民和县调查土族历史和社会情况，收集了大量丰富的资料，相继撰写了《青海土族的政治演变》《青海土族的经济生活》《青海土族民间信仰》《互助土族自治县东沟大庄地区土族社会历史调查》《互助土族自治县红崖子沟地区土族社会历史调查》等调查报告，以及一系列关于土族政治、经济、语言和宗教信仰方面的概述性文章。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民族学科发展缓慢，土族研究基本停滞。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土族研究才有了新的进展。

20世纪80年代，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编写了“民族问题五套丛书”，《土族简史》《土族语简志》《青海土族社会历史调查》及各土族自治县概况相继出版问世。这些民族调查为党和政府在土族地区开展民主改革和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为土族研究搜集

和积累了大量弥足珍贵的资料。此外,20世纪80年代较有影响的有关土族研究的论著有《土族族源讨论集》和《吐谷浑史》。《土族族源讨论集》由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1982年编印,共分五部分,收录了从1928年到1982年50多年间有关土族族源探讨、土族社会概况论述、时人游记、家谱世系等,是百年来土族研究的汇总。周伟洲先生的《吐谷浑史》于1985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该书中,作者主张土族族源为古代活动在青藏高原一带的吐谷浑人,并对吐谷浑的来源、吐谷浑政权的兴衰、吐谷浑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与当时周边政权的关系演变等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和论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土族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和纵深化,涌现了一批研究学者与论著。如李克郁的《土族源流考》又名《土族(蒙古尔)源流考》,于1993年9月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主张土族源于蒙古人,并从土族的语言研究入手,剖析土族社会,从中探索土族的历史渊源,得出“土族(蒙古尔)就是蒙古的一支,是从宋至明初先后来到河湟流域定居的蒙古人”的结论。马光星的《土族文学史》于1999年6月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梳理了土族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不同时期的土族文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特别是对土族民间文学中代表性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并对当代土族作家文学、音乐创作、歌手等进行了介绍,该书是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土族文学历史发展的论著,填补了土族文学史研究的空白。

(三) 21 世纪以来

进入21世纪以来,土族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拓展,其研究范畴与主题呈现出多样化、多向化趋势,研究内容涉及土族的族源与历史、宗教信仰、民俗文化、社会经济、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社区发展与现代学校教育等,其理论趋于丰富与完善,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与教育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与方法被运用到土族研究中,其研究方法也从个体研究趋于跨学科整合研究和团体合作研究,土族研究呈现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兴盛局面。

吕建福的《土族史》于200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主张吐谷浑为土族族源,以大量可靠的历史文献、口碑史料以及民族学资料为依据,详尽叙述了土族先民的迁徙与重组、建国及其盛衰、分布